

我国居民收入 不平等问题研究综述

□薛宝贵 □何炼成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左右,经济总量为世界第二,经济蛋糕已经足够大,但是,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既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本文从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分配不公的概念比较、收入不平等现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收入不平等的价值判断以及对策六个方面,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收入不平等; 机会均等; 人力资本; 生产要素市场

中图分类号: F1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5)02—0082—09

引言

做蛋糕与分蛋糕是经济学的两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全球第二,蛋糕做得已经足够大;但是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比较滞后,收入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分蛋糕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收入不平等问题近年来成为理论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予以研究。大多数学者从城乡、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地区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五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其原因及对策。有些学者另辟蹊径,从阶层固化、劳动份额下降等视角出发,着重强调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有制结构、人力资本投资、腐败、政府政策等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指出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关键是实现机会均等。另外,还有学者研究了收入不平等的价值判断问题,但是理论进展举步维艰。本文以下内容包括: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分配不公的概念比较、收入不平等现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原因、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收入不平等的价值判断以及对策。

一、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分配不公是否一样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竞争,竞争必然导致收入不平等。陈斌开、曹文举^[1](2013)认为,收入不平等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机会均等前提下因个人特征差异,如教育水平、能力和努力程度等造成的收入不平等;一部分是由机会不均等,如家庭财富、社会关系和户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研究”(11JJD790022)

籍制度等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由前者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是良性的,而由后者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容易滋生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冲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收入不平等有合理成分与不合理成分之分,机会均等条件下产生的收入不平等是合理的,而在机会不均等条件下产生的收入不平等就是不合理的。李婷、李实^[2](2013)认为,收入分配格局应从两方面考察:一是收入差距的大小,即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二是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即通常所说的分配公平程度。前者是实证研究的范畴,后者是规范研究的范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收入不平等进行规范研究,找出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并尽量避免收入分配不公的产生。

我们不能把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分配不公两个概念相混淆,合理的收入不平等有利于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的发挥,形成“你追我赶”的竞争格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不允许收入不平等存在,则会走平均主义的老路,干多干少一个样,而平均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收入分配不公。尹恒、龚六堂、邹恒甫^[3](2002)认为,尽管Lucas模型高度抽象,其含义是深刻的,收入不平等是人类社会根深蒂固的东西,为了解释不平等,我们甚至不需要求助于能力、教育、遗传、社会制度等多种要素,仅仅消费偏好的随机扰动就足以产生巨大的不平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收入不平等无处不在,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有收入不平等,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收入不平等。

二、收入不平等现状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在1995—1997年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2.71下降到2.47,在2009—2011年间从3.33下降到3.13,但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总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95年的2.71上升到2011年的3.13,上升了15%。李实^[2]等(2013)的研究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在包含城乡、城市内部、农村内部三种收入差距的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重1995年为41%,2002年为45%,2007年为4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全国居民差距的主要原因。除了城乡收入差距外,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还表现为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可见我国的收入差距是全方位的,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比较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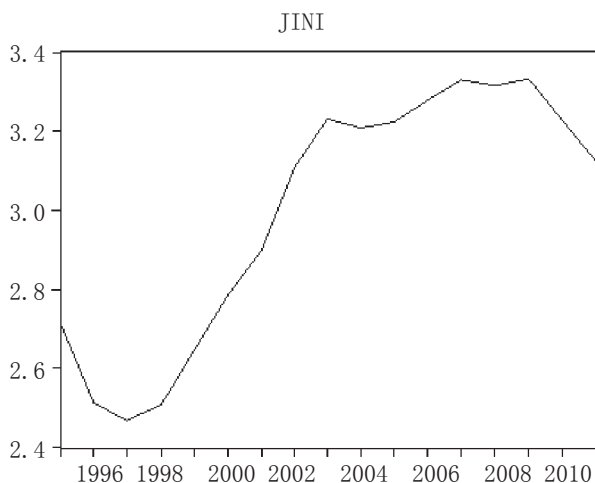


图1 1995—2011年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收入分配出现的另外一种情况是阶层固化,出现“富二代”、“穷二代”现象。Galor和Zeira^[4](1993)用OLG模型在小型开放经济中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视角,研究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化,指出初始财富多的人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初始财富少的人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长期中,社会分化为穷人与富人两个阶层,前者世代为熟练劳动者,收入较高,后者世代为非熟练劳动者,收入较低,并且形成一种稳定状态。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是穷人阶层人数比例较大、中等阶层人数比例较少、富人阶层人数比例极少的“金字塔型”,这与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是不相符的,因而这种

收入分配格局显然是不合理。Banerjee和Newman^[5](1993)从工资和职业选择的角度,分析了收入分配

的动态演化,该理论把人口分为穷人、中产、富人三大阶层,由于初始财富也不同,因而拥有担保的资产多少不同,进而中产阶层和富人会选择收益率较高的自给自足生产或者企业生产的职业,而穷人进入这些职业则有障碍。该理论认为穷人阶层比例较大、中产阶层比例较大、富人阶层比例较小的经济最终收敛至完全平等的状态,而穷人阶层比例较高、中产阶层比例较小、富人阶层比例较小的经济在稳定状态下存在显著的不平等。我国目前就处于后一种状态,因此我们需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破现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较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上述两个理论都特别强调初始财富在收入分配动态演化中的作用,而代际之间的收入传递会导致富人家庭的初始财富始终高于穷人家庭的初始财富,进而导致阶层固化。

(三)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又一特征。黄先海、徐圣^[6](2009)认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我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部门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为了稳定劳动收入比重,应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罗长远、张军^[7](2009)运用1987—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事实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存在“U”型关系,但我国目前还处于曲线的下行区间。李稻葵^[8]等(2009)研究发现,工资率增长率赶不上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导致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伍山林^[9](2011)研究发现,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具有多样性,而垄断和改制即私有化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建议在一定的规则和条件下,让企业自主选择改制深度和分享比例,实现劳动者、雇主和政府的三方共赢。总之,我国目前劳动收入份额处于下降的阶段,拥有劳动要素的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慢于拥有资本要素的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而劳动者的人数占我国居民的大多数,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应该适时、逐步提高劳动收入比重。

三、对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解释

(一)生产要素市场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首先,土地市场不完善。我国农村实行集体土地所有制,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集体财产收益权等财产权利,但农民的这些产权是不完全的产权,农民通过这些权利增加财产性收入会受到限制,并且利益容易被侵占。谢冬水^[10](2014)通过建立城乡二元结构转变模型,分析表明不完全的农地转让权抑制了土地的资产属性和流动性,导致迁移劳动力无法将其在农村的土地财产转移到城市以承担城市的生活成本,使得其难以在城市永久定居,只能选择出卖简单劳动力,这导致了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贫困,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谢冬水所说的不完全的农地转让权,其实就是农民的土地使用退出权,我国法律规定,一旦农户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就必须无偿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钱忠好^[11](2004)认为,我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和组织保障,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驱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地补偿标准制定存在技术上的困难等,导致土地征用中农民土地权益遭受侵害。由于农民土地产权的不完全,在土地非农化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中,农民获得的份额较少,这无疑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其次,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利率的非市场化通过压低存款利率会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陈斌开、曹文举^[12](2013)认为,在我国存贷款利率由政府控制,压低存款利率条件下,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居民一般是存款者,企业一般是借款者,会形成一种居民补贴企业的财富分配机制;而从居民收入分配角度看,穷人是存款者,富人往往是借款者,会形成一种穷人补贴富人的倒挂机制。金融抑制主要是指政府干预金融市场,阻碍金融自由化进程,王小华^[12]等(2014)研究发现,我国县域农村地区内部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收入低的农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和借款能力较差,其所受金融抑制越来越大,使其

难以摆脱困境;而收入高的农民因其自身积累的优势和借款能力强而走向良性轨道。张立军、湛泳^[13](2006)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资源有限,而产生金融资源在各地区、城乡之间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均衡,从而造成地区、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也有影响,李志阳、刘振中^[14](2011)运用我国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短期看,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都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长期看,金融规模扩大加剧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效率提高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向城市自由流动,但是很难获得城市户籍,刘瑞明^[15](2014)发现,大量文献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除了登记与管理人口职能外,背后与一系列福利紧密相关,如教育、养老、医疗等。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当地政府与户籍居民在公共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会歧视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举步维艰。陈斌开、曹文举^[1](2013)认为,由户籍制度而产生的歧视性的公共政策降低了农民工的福利,在城市内部形成“新二元结构”,造成了户籍城市居民与非户籍居民的分割和收入差距。谢桂华^[16](2007)研究发现,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城市户籍背后的福利性收入,如医疗、养老保险、教育等。因此,由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我国的户籍制度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永久迁徙,不利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且容易形成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

(二)所有制结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理论共识,刘瑞明^[17](2011)研究发现,在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地区的所有制结构禀赋会使初始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地区陷入历史锁定效应,而令初始国有企业比重较低的地区快速发展,出现极化效应并导致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张维迎^[18](2010)指出,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国有企业比重越小,收入差距越小,而市场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国有企业比重越大,收入差距越大。前者认为,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比重低的地区生产效率更高,比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收入更高。后者认为,在市场化进程中,国有企业比重小的地区,其内部收入差距较小,国有企业比重大的地区,其内部收入差距较大。为什么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其内部收入差距反而越大呢?何炼成^[19](2011)指出,国有企业无偿占有国家资源不仅不给国家上缴资源利用税,有时还要向国家财政要求补贴,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会获得垄断利润,与民争利,国有企业反而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国有企业员工通过垄断利润获得远高于民营企业员工的高工资,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其内部收入差距越大。吴宣恭^[20](2010)认为,我国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不是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工资收入差别,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是私营企业主与普通劳动者收入和财富的巨大差距。可见,吴宣恭认为私有制存在剥削,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而何炼成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有法律依据的,国有企业的垄断收入才会导致收入分配不公。

(三)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首先,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会造成城乡收入差距。陈斌开、张鹏飞、杨汝岱^[21](2010)研究发现,基于2002年CHIP数据,Oaxaca-Blinder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差异是中国城乡收入差异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贡献程度达到34.69%。张伟、陶士贵^[22](2014)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模型,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基础上,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差异会导致收入水平不同,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并运用我国1990—2011年的数据加以实证检验。其次,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会造成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高梦滔、姚洋^[23](2006)研究发现,基于我国8个省份、1320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使用非参数回归,估计发现教育和在职培训体现出的人力资本是拉大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再次,人力资本会产生代价传递的马太效应,或者说会形成阶层固化。张东辉、司志宾^[24](2007)研究发现,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受到的约束差异及其行为选择有扩大不同收入状况家庭子

辈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倾向,即富者的子辈更富,穷者的子辈更穷。最后,教育回报率也有马太效应,张东伟^[25](2006)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有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加的趋势,最高95%收入者的教育回报率是最低5%收入者的2倍多。通过上述文献我们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人力资本投资不同会导致收入不同,进而产生收入差距,并且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阶层固化效应与回报率马太效应。

(四)腐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按照寻租理论,腐败不会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只会使一部分人的收入增加而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减少,必然导致收入差距。陈刚、李树^[26](2010)基于我国2000—2007年的官方统计数据,研究发现,腐败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的贡献远远高于除去经济增长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腐败的收入分配效应表现为:增加20%最高收入组居民收入的同时降低了其他组的居民收入。陈刚^[27](2011)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腐败显著扩大了城镇内部与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并对腐败对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做了深入研究,发现腐败主要是扩大了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居民间的工薪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不平等,但对两组居民间的经营净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不平等影响不显著。另外,腐败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会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虽然有的学者认为腐败对经济发展有“润滑剂”的作用,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腐败会抑制私人投资,降低投资效率,扭曲人力资本配置,导致社会不稳定,阻碍经济增长。吴一平、朱江南^[28](2012)利用我国县级横截面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研究发现,反腐败力度越大的县收入水平越高,反腐败是我国县级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吴一平、芮萌^[29](2013)利用我国198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对于制度较完善的东部地区,腐败对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于制度相对不完善的非东部地区,腐败与收入不平等呈现倒U型关系。

(五)政府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在我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属于强势政府,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多,并且政府的政策导向会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收入不平等就是影响之一。我国政府实行的东部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等战略都造成了收入不平等。贺大兴、姚洋^[30](2011)认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会造成收入不平等。而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政府就是这样一个中性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导致了收入不平等。我国政府实行的东部、城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就是中性政府的一种理性行为。陈斌开、林毅夫^[31](2010)认为,我国政府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得城市吸纳的劳动力减少,农村劳动力难以向城市转移,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地区使得农村人均收入下降,进一步导致城乡差距扩大。而如果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则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能保持相对较小的水平的重要原因是这些经济体的政策导向。大岛清(1987)、Cho和Kim(1991)、戴宁格尔(2003)^[1]研究发现,二战后经济起飞的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均实行了合理的土地分配政策,强烈刺激了自耕农的耕作和投资,特别重视发展农业,实现了公平的增长。

四、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的促进作用还是负的阻碍作用,仍然有争议。在20世纪80、9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政治经济机制、教育生育决策机制、社会稳定机制、市场规模机制这几类。李宏毅、邹恒甫^[32](1998)在一个典型的政治经济机制里,假定财政支出具有消费性,完全进入个人效用函数,得出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Perotti^[33](1996)认为,在教育决策方面,

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善,富裕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较低,而生育决策是父母对其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权衡的结果,得出收入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Alesina 和 Perotti^[34](1996)认为,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有着强烈的冲动在正常的市场活动或政治渠道之外,进行有组织的寻租,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进而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妨碍经济增长。Murphy、Shleifer 和 Vishny^[35](1989)认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偏好于扩大消费品的范围,而不是增加某种商品的数量,他们发现,在农业国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工业品的市场狭小,从而制约了国内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进入 21 世纪,对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又出现了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劳动供给机制、创新激励机制等研究成果。Grossmann^[36](2008)研究发现,在无信贷约束的条件下,收入不平等越高,会增加总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在信贷约束条件下,人力资本积累会遇到障碍,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前者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后者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Turnovsky^[37](2006)认为,个体越富裕,增加财富的边际效用越低,因此会选择增加闲暇减少劳动供给。随着劳动供给减少,资本报酬相对较少,劳动报酬相对提高,导致收入不平等减少;同时,劳动供给减少将抵消富有者高资本禀赋带来的高增长效应,使增长率下降,从而使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Foellmi^[38](2006)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通过正的价格效应与负的市场规模效应影响创新与经济增长。一方面,富人愿意为创新产品支付高价格,会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形成正的价格效应;另一方面,创新产品在穷人中的扩散较慢,会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形成负的市场规模效应。Foellmi 认为价格效应一般大于市场规模效应,因此收入不平等的加大会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钞小静^[39](2014)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出发,将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引入 OLG 模型,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不愿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抑制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这不仅不利于传统部门自身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也降低了进入现代部门从事生产的劳动力数量,阻碍了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钞小静把二元经济结构引入 OLG 模型,无疑对我国的经济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与现实意义。巩师恩、范从来^[40](2012)研究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 1988—1998 年间,我国收入不平等与消费波动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 1999—2009 年间,我国收入不平等与消费波动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这两个时间段,信贷供给与消费波动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波动对经济增长无疑具有阻碍作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阶段,收入不平等扩大会导致消费波动加剧,而信贷供给增加可以起到平抑消费波动的作用,进而抵消收入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的负的作用。程磊^[41](2011)基于协整理论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利用我国 1978—2009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性地考察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这三种收入差距可以分别解释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的 33.6%, 18.3%, 42.8%。我们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大,我国农村市场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开发。

五、对收入分配格局的价值判断

对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行比较、评价需引入价值标准,而主流经济学通常做法是引入社会福利函数,但由于个体之间的差异,难以得到社会福利函数。Arrow^[3]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利用投票悖论得出了所谓“阿罗不可能定理”,即无法得到社会福利函数,来对各种收入分配格局进行比较。Amartya Sen^[3]认为,阿罗只用到了个人偏好的秩序信息,使得个人之间的效用不可比较,他从阿罗对个人偏好的基本

假设中寻找突破口,逐一放松阿罗的基本假设。森提出了“带名商品”理论,“带名商品”的价格可以反映收入不同的个体对同一自然商品的偏好差异,这样个人效用函数就可以加总得到社会福利函数,从而可以对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加以比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应当秉持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刘国光^[42](2011)对国富与民富、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做了阐述,他认为不能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与政府收入占比,作为国富与民富对比的标准,因为政府收入中大部分是用于民生开支,并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不能“拥抱资本、疏远劳动”。他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虽然在很短的时期迅速完成,但“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却迟迟不能自动实现,要实现共同富裕,除了政府财政调节外,更需要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六、收入不平等的解决对策

(一)通过实现机会均等确保收入分配公平

首先,生产要素市场要不断完善,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均衡配置。(1)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亟待完善,应保护好农民的各项财产权利,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集体财产收益权,使农民的各种土地产权界定明确、流转顺畅,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许庆、田士超^[43]等(2007)研究发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土地按人分配所带来的土地细碎化有利于缩小农村内部不平等,但是,只有保护好农民的各项土地产权,使农民充分分享土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才能缩小城乡收入不平等。(2)政府应当放松对金融市场的控制,减少金融抑制,实现利率市场化,避免居民向企业补贴,穷人向富人补贴,减少收入不平等。另外,金融资源应当均衡配置,在提高金融规模的同时注重金融效率的提高,避免金融资源向富裕地区、富裕阶层集中,减少收入不平等。(3)我国的劳动力市场需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不利于农村劳动力永久迁徙,容易加剧城市内部不平等,我国需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加速人的城镇化进程。

其次,人力资本投资应当均衡。教育投资即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收入的一种重要途径,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异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只有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差距,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才能确实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人力资本投资差异还会引起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阶层固化、教育投资回报率的马太效应等问题。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应当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对贫穷家庭进行教育补贴,避免阶层固化与教育收益马太效应的发生,尽量缩小收入不平等。

(二)政府政策导向应当缩小收入不平等

上文指出,我国政府是中性政府,容易把经济资源向生产力高的部门和地区配置,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实行了东部、重工业、城市优先发展战略,虽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但也造成了地区收入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过去的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转变。我国政府提出的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战略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收入不平等。陈斌开、林毅夫^[31](2010)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在于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东亚的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在经济起飞时能保持较小的收入不平等,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实行了正确的产业政策,我们应当借鉴这种经验。

(三)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目前,我国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与之相对应的是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由于我国劳动要素相对过剩,资本要素相对稀缺,导致劳动收入份额较低,而资本收入份额较高。随着我国人口

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要素会变得逐渐稀缺,劳动收入份额将逐步上升。劳动者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增加劳动收入,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份额。伍山林^[9](2011)认为,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是社会人群中的大多数,只有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才能构建橄榄形的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

(四)突破阶层固化的藩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群体,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增量改革比较容易推进,而存量改革容易触动既得利益阶层的经济利益,改革举步维艰。李婷、李实^[2](2013)认为,房产税与遗产税迟迟不能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既得利益群体的极力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僵化会形成一种相互强化的过程,既得利益集团越强大,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越大,甚至会拖死改革。作为中性的我国政府需突破阻挠,征收房产税、遗产税,实现社会的公平。刘国光^[42](2011)指出,我国现行税制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占七成以上,而间接税最终由消费者买单,个税征收的主要对象是工薪阶层的劳动者收入,而对股息、红利、财产租赁等资本所得征收甚少。基于此,他提出应提高直接税收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收的比重,在直接税中,提高资本所有者的税负,降低劳动者的税负,开征房产税与遗产税。

(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按照寻租理论,腐败只会使一部分人的收入向另一部分人转移,不会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必然导致收入不平等,并且腐败会降低私人投资效率,破坏公平竞争,不利于腐败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且造成地区收入不平等。破除腐败需标本兼治,一方面,需加大打击腐败的高压态势,另一方要从制度上加以防范。在制度上,应加强民主监督、媒体监督、舆论监督,对权力加以制衡,培育服务型政府,减少行政审批权。我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仍有大量的行政审批权,容易滋生腐败,只有大大减少行政审批权,才能根治腐败,避免权钱交易。

参考文献:

- [1] 陈斌开, 曹文举. 从机会均等到结果均等: 中国收入分配现状与出路[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 (6): 44-59.
- [2] 李 婷, 李 实.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 难题、挑战与出路[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 (5): 34-43.
- [3] 尹 恒, 龚六堂, 邹恒甫. 当代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J]. 经济研究, 2002, (8): 83-91.
- [4] GALOR.O. and ZEIRA.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3, (1): 35-52.
- [5] BANERJEE.A. and NEWMAN.A.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 274-298.
- [6] 黄先海, 徐 圣. 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视角[J]. 经济研究, 2009, (7): 34-44.
- [7] 罗长远, 张 军.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09, (5): 25-35.
- [8] 李稻葵, 刘霖林, 王红领. 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 经济研究, 2009, (1): 71-82.
- [9] 伍山林.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 一个微观模型[J]. 经济研究, 2011, (9): 55-68.
- [10] 谢冬水. 农地转让权、劳动力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经济问题, 2014, (1): 49-59.
- [11] 钱忠好, 曲福田. 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 (12): 4-9.
- [12] 王小华, 温 涛, 王定祥. 县域农村金融抑制与农民收入内部不平等[J]. 经济科学, 2012, (2): 44-54.
- [13] 张立军, 湛 泳. 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分析及其检验[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12): 73-81.

- [14] 李志阳, 刘振中.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不平等: 理论与经验解释[J]. 经济科学, 2011, (6): 10-18.
- [15] 刘瑞明. 户籍制度改革与政府侵权行为的制约: 在流动中保护产权[J]. 人文杂志, 2014, (6): 26-33.
- [16] 谢桂华. 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J]. 社会学研究, 2007, (5): 84-109.
- [17] 刘瑞明. 所有制结构、增长差异与地区差距: 历史因素影响了增长轨迹吗?[J]. 经济研究, 2011, (2): 16-27.
- [18] 张维迎. 市场的逻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19] 何炼成. 也谈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与解决途径[J]. 经济学动态, 2011, (2): 54-55.
- [20] 吴宣恭. 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与解决途径[J]. 经济学动态, 2010, (11): 12-19.
- [21] 陈斌开, 张鹏飞, 杨汝岱. 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管理世界, 2010, (1): 36-43.
- [22] 张伟, 陶士贵. 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与改善的路径选择[J]. 中国经济问题, 2014, (1): 70-80.
- [23] 高梦滔, 姚洋. 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 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 经济研究, 2006, (12): 71-80.
- [24] 张东辉, 司志宾. 人力资本投资、就业双轨制与个体收入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代际间资本转移视角的一种解释[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10): 14-19.
- [25] 张东伟. 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与收入差距: “马太效应”及其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 2006, (12): 59-70.
- [26] 陈刚, 李树. 中国的腐败、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J]. 经济科学, 2010, (2): 55-68.
- [27] 陈刚. 腐败与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南开经济研究, 2011, (5): 113-131.
- [28] 吴一平, 朱江南. 腐败、反腐败与中国县级收入差距[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 (2): 29-39.
- [29] 吴一平, 芮萌. 制度差异、地区腐败与收入不平等[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3, (3): 165-178.
- [30] 贺大兴, 姚洋. 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1, (1): 4-17.
- [31] 陈斌开, 林毅夫.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J]. 南开经济研究, 2010, (1): 3-18.
- [32] HONGYI LI and HENGFU ZOU. 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8, (3): 318-334.
- [33] PEROTTI R.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2): 149-187.
- [34] ALESINA A. and R. PEROTTI.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6, (6): 1203-1228.
- [35] Murphy K.,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Income Distribution, Market Size and Industrializa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104): 537-564.
- [36] GROSSMANN V. Risky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 Dynamics[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8, (1): 19-42.
- [37] Gada-Penalosa and Turnovsky. Growth and Income Equality: a canonical model[J]. Economic Theory, 2006, (1): 25-49.
- [38] FOELLMI and ZWEIMULLER.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and-induced Innovation[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6, (4): 941-960.
- [39] 钞小静.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4, (6): 30-43.
- [40] 巩师恩, 范从来. 收入不平等、信贷供给与消费波动[J]. 经济研究, 2012, (1): 4-14.
- [41] 程磊. 收入差距扩大与中国内需不足: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经济科学, 2011, (1): 11-24.
- [42] 刘国光. 关于国富、民富与共同富裕问题的一些思考[J]. 经济研究, 2011, (10): 4-8.
- [43] 许庆, 田士超, 邵挺, 汪学军. 土地细碎化与农民收入: 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6): 67-72.

(收稿日期: 2014—10—08 责任编辑: 谭晓梅)